

(美) 艾尔曼 著
赵 刚 译

从理学到朴学

——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随着明清之际的政治剧变，中国学术精神亦随之突变。在随后的岁月中，青灯黄卷，读书人日复一日，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其间却有着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反映出“读书人”心灵深处的冲突与人生观的巨变……

(美) 艾尔曼 著

赵 刚 译

本书责任编辑委 雷颐

从理学到朴学

——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从理学到朴学
编 著 者 [美]艾尔曼
责任编辑 周文彬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页 2
印 数 1—5000 册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442—4/G·375
定 价 10.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DI64/22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借鉴与创造。为此,我社在优先出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著作的同时,也适当选择一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出版。海外学者占有的丰富资料,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某些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评估中国文化的传统、心态及其前景,从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的建设,都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当然,他们的著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同我们存

在着某些原则分歧,这是需要读者加以认真审察和辨识的。同时,任何借鉴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靠我们自已从中国当代的实践中去概括和总结。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只求为此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和比较。如果这套丛书能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欣慰。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 100 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1988 年

著者中文版序

最近,我高兴地获悉拙作《从理学到朴学》中文版已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先,我衷心感谢故宫博物院陈列部的赵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颐先生。赵刚先生花费大量精力、时间把此书译为中文,雷颐先生认真审定了译稿。再次,我向挚友,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洛杉矶加大访问教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王俊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陈祖武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部书的中文版是无法问世的。最后,谨向戴逸教授、杨向奎教授、汤志钧教授致以深谢,在我 1983~1984、1992、1994 年秋三次来华访问研究时,他们及所在单位均给予我巨大的帮助。

《从理学到朴学》是我首次来华之前完成的,1983 年来华之后,对此书作了进一步修订,然后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出版。此后,我得到美国全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于 1983~1984 年来华从事研究工作,以此为基础,完成了我的第二部著作《经学、政治、宗族:中华帝国晚期的常州今文经学》。该书主要论述了常州今文经学,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获 1992 年度的伯克利奖金,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

以奖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优秀东亚研究论著。没有1983~1984年在华获得的新资料,我是不可能获得这项奖励的。

《从理学到朴学》出版后,得到欧美、日本汉学界的好评,获1985年度费正清奖,日文本正在筹划之中。该书第一版售罄之后,哈佛大学出版社又于1990年出版了平装本。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注意本书综汇学术史、社会史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它采用了欧美最近出现的“新文化史”方法,这种方法摒弃了传统学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作法。中国学者将会发现,《从理学到朴学》一书旨在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这一考据学赖以生存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后为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摧毁。

本书还着重讨论了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崛起。与传统著作中俯拾即是的思想史研究理路不同,本书更注重“哲学的框架”(fieldwork in philosophy)。读者若对这种新颖的文化史研究方法感兴趣,可进一步阅读前面提到的最新出版的《经学、政治、宗族》,该书从武进庄氏与阳湖刘氏两个家族长期拥有的显赫地位探寻常州今文经学的兴起。乾隆末年,庄存与转向公羊学,嘉庆初年,刘逢禄运用考据学为今文经学辩护,这些现象都可以从庄、刘两族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声望加以解释。1780~1790年和坤擅权也是刺激庄存与重视公羊学的重要因素。除此而外,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著《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十二期,1992年5月,页1~15)。

我希望这部书的中文版能为中国读者批评指正。1984年,本书英文版问世时,应我的请求,出版社在封面印上了篆书“实事求是”四个字,因为考据学者动用古代遗物复原古史,成为现代考古研究的先驱,1984年以来,“实事求是”的主张再度在中国广为

提倡,犹如 18、19 世纪之际的乾嘉学派。

与清代考据学相比,现代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有相当大的改进,但这并不能抹煞清代考据学通行的研究方法的历史意义。现代中国学术固然深受西方学术和科学的影响,但是 we 不应忘记,中国现代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人员曾受惠于清代学者的考证成果,如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研究,戴震的声类研究,段玉裁《说文解字》的研究,王念孙的训诂学研究。没有清代金石学者奠定的坚实基础,中国考古学者恐怕不可能释读甲骨文。清代考据学的许多特点常使我们想起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众多思想家和学者。此外,17、18 世纪的考据学、实学思潮还东传日本、朝鲜,推动了 18 世纪朝、日两国实学的兴起。

最后,我再一次向所有为本书中文版问世尽心尽力的同仁致意。

1994.11.1 于北京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译出

目 录

著者中文版序 1

著者初版序 1

第一章 中华帝国晚期的学术话语革命 4

第一节 江南学术界的内外环境 6

第二节 清代政治与学术 10

第三节 理学的解体 19

第二章 考据学派与共认的认识论观点的形成 27

第一节 考据学的出现 28

第二节 明亡的冲击 35

第三节 实证学风的冲击 41

第四节 专业化与实证学风 47

第三章 江南学者的职业化 60

第一节 考据学派的社会起源 61

第二节 中华帝国晚期的职业化 67

- 第三节 官方与半官方赞助 70
- 第四节 江南学界与书院 80
- 第五节 士大夫社会角色的转变 92

第四章 学术、图书馆、出版业 99

- 第一节 江南的藏书楼 101
- 第二节 江南出版业 106
- 第三节 资料收集与考证研究 113
- 第四节 乾嘉时代的目录分类 115

第五章 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 120

- 第一节 通行的研究方式：札记体著作 121
- 第二节 考据话语中资料运用 123
- 第三节 协作、书信和会晤 136
- 第四节 累积性研究 141
- 第五节 学术发明权的争论 153
- 第六节 考据学派的“进步”意识 159

第六章 考据运动的终结 161

- 第一节 考据运动的衰落 161
- 第二节 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 172

结论 177

注释 180

参考书目 216

著者初版序

如何区分清朝衰亡和中国传统社会整体性崩溃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令现代中国的历史学者极为困惑的复杂问题。最近,孔飞力(Philip Kuhn)在对近代中国早期历史的精辟论述中,对此提出了新的答案。他认为,只有假定在 19 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尚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才能承认,惟有西方势力的介入,才加速了传统王朝体制的解体,导致横扫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总体性革命的爆发。不过,他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表明,早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社会权威及权利结构、儒家精英阶层的凝聚力已开始崩溃瓦解。 xix

只要我们把清代历史的研究重点从社会关系转向学术思潮,就不难发现,知识阶层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 18 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趋尖锐的挑战。这种挑战明显反映于他们的语言、数学、天文、地理、金石实证性研究之中。18 世纪的知识分子,运用这些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儒学遗产众多理论的合理性,对宋明理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所充斥的空疏之风极为不满。儒家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经由史学化,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这是知识阶层思想变化最显著的标志。 xx

要研究清代考据学运动的广泛影响,就必须了解它赖以形成、发展的学术共同体。清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长江下游地区已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当时,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研究的发展,不属于本书即将讨论的考据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换言之,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不同于政治官僚,他们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但是,这个群体影响巨大,意义深远,聚集着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他们通过知识传播的组织与机制走到一起,就寻找、发掘知识的途径达成共识。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曾对专业化学者形成的共同体与技术性写作实体的关系进行过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本书将运用他的研究成果,探讨清代学术共同体的总体特点,重点分析清代学术形成内在与外部的成因。此外,我们还将借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阐发的“话语”理论。我们认为,考据学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学术性谱系和意义。实证方法的形成、流行,展示了17、18世纪中国在语言使用和意义上的剧烈变化。作为思想学术事件,实证性朴学话语特点的逐步形成是基本学术观念变化的反映。后者同时还引发了对传统认知和理解的更重大的基本变革。从前公认的学术范式受到了致命的挑战。

本书第一章将集中讨论这场学术话语革命发生、发展的脉络。第二章将深入讨论17、18世纪的学术成果及其透露的学术走向,介绍考据学者的文献考证,史学、科学建树。第三、四章将阐述考据学专业性学术共同体产生的社会、学术机制,这种为江南中心城市考证学派形成而建立的机制还是中华帝国晚期学术研究“职业化”的标志。

18世纪的考据学研究是在一个生机勃勃,充满进取意识的学术环境中展开的。这种环境即是本书第五章的讨论重点。那些采用实证方法的考证专家,经过不懈努力,在清代的江南地区,形成

了一个相对自主,拥有独特学术规则的社会群体。它尽管受到太平天国战乱的破坏,但是,其学术遗产并未消亡。考据学派的出现毕竟拉开了中华帝国晚期重新审视正统儒学传统的序幕。

时至今日,18世纪的中国史,也即“康乾盛世”,仍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当然,并非没有别具慧识的学者。但是,中国近现代多数学者在探索和重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险象环生的历程时,只重视17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对于18世纪则有所忽略。本书下面将指出,18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17世纪以来政治、学术变革的延续及其发展的极致,其影响甚至播及19世纪乃至20世纪。18世纪的历史是17世纪满族入关到19世纪西方入侵的漫长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不应被孤立出来,搁置一边。 xxii

对于这段充满变化而又为现代中国史学家长期忽略的历史,本书的研究仅是一个引子和开端。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些研究提醒那些对18世纪兴趣日趋浓厚的学者,对有关这段历史的传统观点需做进一步的修订和检讨。我们还希望本书在推进美国学术界重视18世纪中国史方面能尽绵薄之力。本书分析了18世纪众多的历史线索,但是,还有许多历史线索有待澄清,不少本书无力涉及的学术空白亟待填补。总之,我们的讨论不是研究的终点,它只是对这段历史研究的开始,仅仅扫清了某些障碍,为后继者的进一步探索铺平了道路。

1 第一章 中华帝国晚期的学术话语革命

2

中国从帝制时代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西方史学家总是认为,中华帝国发展到晚期,业已腐朽衰落,失去生机。他们在向前追溯鸦片战争(1839~1842)和太平天国叛乱(1850~1864)的历史根源时,通常把中国在现代化运动中的落伍归咎于18世纪及以前的历史进程,认为中国当时衰弱、停滞,欧洲朝气蓬勃、正在走向工业化,双方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过于肤浅,业已过时,它完全忽略了宋(960~1279)、元(1280~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1)各朝对中国现代化的出现、儒教传统的式微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书认为,17、18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

3

17世纪,儒家知识分子毅然摆脱了前代儒学理论框架的限制,他们提倡客观实证学风,要求通过这种方式,恢复理想的古代社会,并以此为突破口,向官方正统学说发动猛烈攻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主张与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语言学家洛伦·维拉(L. Valla 1407~1457)、德塞代洛斯·爱拉斯摩斯(D. Erasmus 1466?~1536)的观点是非常相似的。清代小学家同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追求语言的简明、清晰、纯净,这

4